

最近,省文物局公布了第二批“山东省文物修复师”名单,让文物修复师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修补古物,与古人对话,颇具神秘色彩的文物修复师到底是怎样的一种体验?让我们走近一位文物修复师一探究竟。

【人物志】

文物修复师：与古人对话

□本报记者 范佳 实习生 马卓仪



蔡友振在修复铁佛首



鹿型席镇修复前



鹿型席镇修复后

山东省文物局在“2018年国际博物馆日”公布了第二批“山东省文物修复师”名单,入选的121名文物修复师,专业涉及陶瓷器、玉石器、青铜器、书法绘画、古建筑等13个类别。蔡友振所在的单位山东省文物保护修复中心负责对这些修复师进行信息管理。

其实,文物修复师蔡友振是个标准的“80后”,他和文物结缘要追溯到大学报志愿时,一开始他并没报与文物相关的专业,但最终被调剂到了西北大学文物保护技术专业,有趣的动手过程和修复之后的成就感让他逐渐对专业产生了兴趣。他大学时第一次实践课便是对彩绘陶器进行修复,在实验室中,两三人一组修复陶器碎片,对陶器表面的彩绘进行清理、加固。

尽管学习的理论难免枯燥,但文物背后的故事让蔡友振着迷。比如为什么一些汉代陶俑比较残破,深究其中便会发现,有的是被盗墓贼打烂的,因为盗墓贼更想要玉器、铜器等“价值比较高”的文物,有些器物破碎则是由于墓葬棺槨坍塌所致。

2006年蔡友振毕业后正式成为了一名文物修复师。每天与文物打交道,一开始难免感到寂寞。但从事了十几年的文物保护修复工作,蔡友振发现自己的性子变得越来越沉稳。他笑言自己一天不修复文物就好像少了什么东西。每看到一件破损文物,总想尽快弄清楚它背后的故事和修复方法。

蔡友振依稀记得他工作后修复的第一件文物是一尊小型精美铜佛像。修复过程中最难忘的是器物的矫形以及做旧。有美术功底的人对于这项工作就能凸显出优势,他们对颜料色彩的把握比较准确到位,一般很快就能调出需要的颜色。而初学者,很难一次成功,这需要多次尝试,从失败中总结经验,逐步提高技术水平。

在大众眼中,文物修复师有着神秘的色彩,而在蔡友振看来,他们的职业和大多工作也有相似之处,比如工作前期准备:签到、穿戴工作服、填写工作计划、修复工具检查、文物出库登记、领取文物等。目前他们修复的大多是馆藏文物,工作场所一般在地市博物馆进行,且修复场所均配备安防、消防设施及通风设备,保证器物安全和修复师人身安全。

做好文物修复,不仅要手巧,文化底蕴也很重要。

蔡友振和其他几位同事曾修复过一件隋代大铁佛首,从实施方案细化、技术风险评估、文物本体修复到后期搬运存放,足足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这件铁佛首高110厘米,重150公斤,修复难点不仅在于器物较大、操作不便,还在于佛首面部残缺严重,如下巴、嘴唇、鼻等部位缺了近三分之一,需要将佛首面部神态、神韵修复到位。

第一次佛首面部修复并不理想。蔡友振便查阅了不同年代佛像造型的历史资料,待修复的铁佛首是隋代文物,保留了北朝造像的特点,同时又体现了向唐代过渡的特点,面部比较丰满。经过一番研究,修复师们才找到了感觉。当然修复

工作必须在有依据的情况下实施,不能凭空臆造,佛首面部修复同样如此。修复师根据佛首面部的对称性,参考相对完整部位,测绘各部分尺寸并绘制图纸,然后再着手修复。

蔡友振还修复过一个汉代铜席镇,器物造型别致、制作精美。所谓席镇,就是古人用来压席子的器具,造型各异,如蝙蝠、鹿、仙鹤等造型,寓意“福禄寿”。他修复的席镇是鹿的造型,代表着高官厚禄,也蕴含着古人对福禄寿的向往。材质主要是青铜和贝壳。只见铜鹿的背部驮着一枚大贝壳,贝壳顶部紧贴鹿角,造型别致,席镇中含有铅块,起到垫压作用。这件席镇鹿角和贝壳部分缺损。其中鹿角部分为铜质,通过传统修复工艺铜皮打制、镌刻、补配;贝壳残缺处选用古代遗址出土贝壳,研磨成粉后通过现代胶结材料调和、塑形补配。后期再通过调制颜料,做旧处理,使之整体协调自然。

蔡友振感慨,这些文物都是古代优秀传统工艺的印证,凝结着古人的智慧。即使是局部很小的饰件,制造工艺也特别精美。他曾修复的一件铜铺,腹部一周透雕有镂空兽头,尽管兽头面部直径只有几毫米,但是动物的眼睛、鼻子依然清晰、逼真,造型特别传神。

令蔡友振称赞的还有一个铜壶造型的官方度量衡,类似于量杯,这是过去人们生活实物的见证。蔡友振在清理度量衡表面时发现壶身刻有文字,通过铭文信息提取,可以了解器物作为官量的标准,该器物为第十件,应该为一组出现,对于研究当时的官量标准具有重要实物参考价值。这件度量衡的腹、底部残缺,需要塑形补配。修复工作需要测绘尺寸、建模,通过铜皮淬火工艺处理,提高材料可塑性,然后根据各部分详实数据,进行剪切、塑形、焊接补配处理。

随着时代的发展,文物保护修复的理念也发生着变化。“我们的文物修复观念和国外有一定差别。”蔡友振说,国外文物保护修复注重可辨识性,让人能看出哪些部分是修复过的,哪些是原始面貌。比如意大利古建筑罗马柱的修复,大部分采用砖石来修补,并没有进行做旧处理,尊重历史的原真性。而从中国传统文化来看,讲究事物的美感和整体统一、协调性,这也是中西方修复理念不同的体现。随着中西方文化的交流,文物修复理念的融合,先进的修复理念也逐渐影响着当代的文物修复,也促使文物修复工作上一个台阶。

作为一名“80后”,在蔡友振看来,文物修复不仅是手艺活,还充满着高科技的色彩。

当前文物修复注重分析检测技术的应用,这也为文物修复提供了精准依据,比如为文物做一次“X光片”探伤检测。古代青铜器在铸造时,会设置垫片(也叫芯撑)来保证内外范之间的空腔。有些文物为了节省铜料,在局部如足、耳等部位设置“盲芯”,减轻器物重量。这些信息在器物外边一般是看不到的,通过拍摄“X光”探伤照片,文物内部结构便一目了然,这对于文物制作工艺研究和后期修复工作都有很大帮助。

【文化观】

达·芬奇争议之作《美丽公主》来华首展

□朱文龙



2019年恰逢达·芬奇逝世500周年,为了纪念这位不世出的艺术天才,今年5月到8月,一场名为“达·芬奇与鲁班艺术科学国际大展”的展览在北京举行。在达·芬奇众多的画作中,首次在中国展出的《美丽公主》备受注目,因为它的身份一直颇具争议性。

众所周知,达·芬奇生活在文艺复兴时期,但是《美丽公主》这幅画出现在公众视野,却是在达·芬奇去世四百多年之后。

1998年,美国纽约佳士得拍卖会出现了一幅少女的侧面像,由墨水、粉笔和水彩在羊皮纸上绘制而成,少女的穿着带有明显的15世纪晚期米兰的风格。

这幅作品的拍卖人是一位艺术品修复师的遗孀。根据丈夫在世时留下的信息,这位太太称这幅少女侧面像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而拍卖行的鉴定者却认为它的创作时间要晚得多,不过是一幅19世纪初某个德国不知名画家的画作。

无奈,拍卖人只得相信鉴定专家。于是这幅画便以《穿文艺复兴时装的19世纪德国少女肖像》为名参加了当年的拍卖,并以极低的价格成交了。

后来这幅画几经辗转,最后由加拿大的收藏家彼得·西尔弗曼收藏。这位收藏家仔细观察画作之后,觉得画像的年代要远比19世纪久远,应当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为了证明自己的判断,他又去找了几位在艺术行业中非常有成就的朋友对画作进行鉴定,大家对彼得·西尔弗曼的判断都表示赞同。

随后,这幅画作接受了各种检验(包括碳-14检测、多光谱扫描等)、史料考证。2009年,苏格兰国家艺术馆馆长在《泰晤士报》上发表文章,认为这幅画是达·芬奇的真迹。

这一结论也得到了牛津大学艺术史教授,达·芬奇作品权威专家马丁·坎普的支持。他还为这幅画作起了一个更有内涵且恰当的名字《美丽公主》。

就在一切尘埃落定的时候,英国人肖恩·格林哈尔突然在自己的著作中称,《美丽公主》这幅画是他1978年所作,主人公名叫萨莉,是他在超市打工时的同事。按照他的说法,他弄到一张1587年的古董纸,又找来一块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时期课桌的桌板作为底板,炮制了这幅画。

不过肖恩·格林哈尔的说法,在学界看起来不值一驳,技术鉴定结果显示,画作所用颜料至少有250年历史,而那时肖恩·格林哈尔还没有出生。

马丁·坎普之所以要为这幅画作取名《美丽公主》,是因为他推测画中人物是文艺复兴时期,米兰公爵斯福尔扎的私生女碧安卡。

如今的意大利形成于19世纪晚期,在此之前,亚平宁半岛长久处于分裂状态。在文艺复兴时期,位于半岛北部的米兰实力最为雄厚,这座城邦的统治者就是米兰公爵斯福尔扎。

斯福尔扎极力庇护艺术家和科学家,使米兰宫廷成为欧洲最光辉煌的场所。艺术家、诗人、音乐家群贤毕至,其中包括达·芬奇。

碧安卡是斯福尔扎的私生女,他在这个女儿非常重视。1489年10月,斯福尔扎公爵采取法律手段,将碧安卡的身份合法化。第二年,碧安卡被许配给斯福尔扎最为宠爱的军队统帅加莱亚佐·桑索维里诺。

加莱亚佐是宫廷中的重要人物,公爵的亲信,也是达·芬奇的一位主顾。

按照婚约,碧安卡将会在13岁的时候嫁给这位大将军。有专家进行推测,这幅画作就是达·芬奇在订婚派对上奉加莱亚佐之命画的。

按理说,碧安卡青春年少,加莱亚佐英勇非凡,美人英雄,相得益彰,没想到就在这对佳人成婚没有几个月,噩耗就传来了。

碧安卡新婚才四个月,斯福尔扎公爵突然收到了一封信,称碧安卡在维杰瓦诺死于一场致命的腹痛,可能是一次宫外孕,最好的宫廷御医也束手无策。下毒的谣言不可避免地传开了,朝廷中人心惶惶。后来,斯福尔扎公爵亲自做了调查,认为女儿是死于难产,这时人心才渐渐平定下来。

关于《美丽公主》的争议并未有最后结论,《星期日泰晤士报》曾经有一篇相关报道,第一句话就是,“这是一个1亿英镑的问题,但是艺术界无法回答出这个问题。”